



中国天主教 述评

【顾裕禄·著】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中国天主教
述评



中国天主教

【顾裕禄·著】

述评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天主教述评/顾裕禄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ISBN 7 - 80681 - 607 - 0

I. 中... II. 顾... III. 罗马公教—基督教史—中国 IV. 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2040 号

中国天主教述评

作者: 顾裕禄

责任编辑: 边 集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www.sassp.com E-mail: sassp@online.s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625

插 页: 2

字 数: 216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2100 册

ISBN 7 - 80681 - 607 - 0/B·011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吴玉辰

这是一位老人呕心沥血之作。作者的优势,一是他生长在教徒家庭,从小就读于教会学校,懂得天主教的知识、礼仪和历史,对天主教的特点有深入了解。二是解放后作者积极投身天主教界的反帝爱国运动,长期在爱国会工作,编写报刊,参与一些文件的起草和讨论,积累了大量资料。三是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掌握两种外文,能将中外资料相互比照,去伪存真,这为他写作本书创造了有利条件。

多年从事天主教爱国会实际工作,继而又从事宗教研究工作的经历,使作者能比较客观地评述天主教的历史。他在“前言”中开宗明义:今天时代变了,社会变了,宗教也会发生某些相应的变化。“我们对宗教的认识,也应与时俱进。”接着,作者用平实的语言阐述自己对天主教的看法:“调动宗教中的积极因素,化消极为积极,有两个条件是不可缺少的,一是国家形势好,党和政府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耐心细致并热情地做好争取、教育、团结教徒的工作;二是宗教界先进人士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带动广大教徒走爱国爱教的道路”。“今天,中国天主教徒发扬‘爱主爱人’的精神,摒弃历来教皇的反共主张,割断政治上和经济上同梵蒂冈的联系。是天主教徒,但决不做梵蒂冈的‘公民’,这是爱国主义的正义行动,也是爱教的

具体表现。”

这些话倾注着一个老知识分子对党和国家事业大局的考虑，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同志在 60 多年前说过，“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天主教有 2000 年历史，10 亿多信徒，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宗教之一。从明末传入中国算起，也有 400 多年历史。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和中国革命建设的深入发展，天主教和中国社会、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特殊复杂性，非常值得研究。但要研究得深透、准确，以为后人之鉴，殊非易事。作者作了尝试。他在书中以人物为纲，条分缕析，简明扼要，来龙去脉交待得清楚。明末清初以降，外国传教士纷至沓来，行踪不定，要写清楚是有一定难度的。作者从大量中、外文资料中梳理史实，道前人所未道。如对唐代景教和元代的也里可温教，学界已有较多论述，作者引经据典，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天主教在明清鼎革之际与明廷、清廷的关系，书中也作了清晰的叙述。又如 1886 年教皇良十三世想直接支配在中国的天主教，曾与清廷商议互派使节，由于法国政府坚决反对而未成。到 1922 年教皇庇护十一决定派刚恒毅为驻华“宗座代表”，为了防止法国阻挠，决定不向外公布，待刚恒毅到了香港才公布身份。由此可见，在派遣传教士的问题上，西方各国从各自利益出发而勾心斗角，罗马教廷与一些有天主教的国家经常发生矛盾，原因是梵蒂冈对各国的实际情况并不清楚，它屡犯错误是难免的。再如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扶植伪“满洲国”时，梵蒂冈是当时很少几个承认伪“满洲国”的国家之一。教廷委派了驻伪“满洲国”代表，开展了许多不光彩的活动。作者搜集了大量中外文字和图片资料，用事实揭露历史真相，可谓铁证如山。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天主教界掀起的反帝爱国运动，并由此

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是中国天主教的必然选择。作者身临其境,以翔实的史料记述了这一历史进程。书中引用的天津天主教爱国人士张羽时的长文,曾于1951年9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对当时全国天主教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作者本人也受到震撼。它为以后开展反帝爱国运动作了舆论先导。书中披露的汉口、武昌两教区神职人员联合发出的对教廷传信部无理否认其合法选举主教的质问书,今天读来,仍有现实教育意义。至于50年代上海天主教界的反帝爱国和独立自主办运动,作者更加熟悉,他主编的《信鸽》报发挥了重要作用。2000年的反“封圣”斗争,是中国天主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爱国爱教、走独立自主办道路的又一壮举。这一事件也进一步暴露了梵蒂冈坚持与社会主义中国为敌的错误立场并没有根本改变。而台湾地区的主教团,正是利用“封圣”事件制造混乱,乱中取利。作者通过这一事件,揭示中梵关系的症结所在,表明了鲜明的立场观点。

马相伯、于斌是近代中国天主教史上的重要人物。一个爱国,一个反共,这在历史上已有定论。作者将这两个人物置于特定历史背景下进行审视,使读者看到一个较为完整的人物形象。过去写马相伯,比较多地写这位爱国老人爱国的事迹,而他作为虔诚教徒爱教的一面几乎很少提及,作者在本书中将爱国与爱教结合起来写,在写爱国主义的同时写了他曾一度离开教会的原因,以及后来的忏悔,晚年从事教会工作和宗教生活的情况。于斌作为梵蒂冈在中国建立“圣统制”后的南京总主教区总主教,政治上投靠蒋介石政权,坚持反共立场,为人民所唾弃。但是他凭借自己在天主教界的地位和影响,曾呼吁抗日,到国际上活动,谋求对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同情和支持,表现了他爱国主义的一面。

在宗教工作中,有人将天主教工作揶揄为天字第一号难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情况若明若暗,对历史和现状分析研究不够。

学术研究如何及时、有效地转化为政策依据,恐怕还缺少链接。领导干部日理万机,能静下心来读点宗教书的不多。这类书也不大好读,因此,为读者提供一些通俗易懂的读物,尤其有关天主教这样的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熟悉的宗教书籍,是非常必要的。本书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发扬一贯的严肃认真作风,几易其稿,反复推敲,取材力求准确,立论力求公允,特别是对他熟悉的那部分史实写得尤为充分。其老而弥坚的精神值得称道。这是我初读这本书的一点感想。权作序。

前 言

我们对宗教的认识,也应与时俱进。

宗教不是一成不变的。时代变了,社会变了,环境变了,生活条件变了,人们思想变了,宗教也会发生某些相应的变化。当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宗教相信神的存在,相信彼岸世界,这不会变;否则也不成其为宗教了。

宗教有这个宗教,又有那个宗教。各个宗教有各个宗教的情况,特别是各宗教都有各宗教的教徒,而各宗教的教徒除了各相信自己的宗教外,在其他许多方面有不同。拿天主教来说,西方国家的天主教徒,中国的天主教徒,大家都信奉天主教,但西方国家的教徒是他们本国的公民,须遵守他们国家的国法,而中国的天主教徒则是中国的公民,须遵守中国的国法。因此,我们说宗教不是不变的而有其可变的一面,指的就是这个或那个宗教中某些情况的变化。

拿中国天主教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过去 50 多年中,它已发生很大变化:摆脱了外国势力的支配,走上爱国爱教的道路,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民主办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的这样一种变化就告诉了我们:宗教不是完全没有积极因素,其消极因素也不是完全不能转化。

调动宗教中的积极因素,化消极为积极,有两个条件是不可缺少的:一是国家形势好,党和政府全面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

策,耐心细致并热情地做好争取、教育、团结教徒的工作;二是宗教界先进人士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带动广大教徒走爱国爱教的道路。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写了这本取书名为《中国天主教述评》的书,一方面对天主教的传入和明末以后至近代几个不同时期它所走过的道路和发生的若干大事,从学术研究角度作探索,同时用自己多年工作中的经历和见闻为当代中国天主教留下一份真实史料;因此,它不同于过去和近些年来出版的有些关于天主教的读物或详或简地叙述中国天主教历史。也就是说本书主要是为了对中国天主过去是怎样的,现在又怎样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有所论述。

明末清初时期的天主教和鸦片战争后不一样。那时中国是独立和主权完整的国家,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虽然有外国的背景,但他们必须服从中国政府,遵守中国国法。这一时期,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得以在中国居留和传教,一是适应当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习俗,二是介绍欧洲科学知识,结交上层人士,三是耶稣会士中有为中国朝廷服务的历法专家。至于中国教徒方面,他们从传教士手中受洗信教,主要是在思想认识上接受了天主教信仰。徐光启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研究天主教教义,认为可“补儒易佛”,信了天主教,并劝化亲友也信。徐光启等中国天主教徒对天主教初传中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教皇干涉中国内政,不许中国天主教徒拜孔祭祖,既导致康熙帝于晚年改变了对天主教的宽容政策,也惹怒许多教徒因要他们违反中国传统思想和习俗而不再相信这个教。雍正帝继位,即正式下令禁止传习天主教。从此天主教一落千丈,如果不是近代西方列强用兵舰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重入内地,天主教早难生存下去。

鸦片战争后,中国失去了独立和主权完整,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天主教又发展了,但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西方国家各天主教修会和外方传教会派遣来华的传教士虽然主观上一般都有着宗教动机,但政治上他们无不站在侵略中国的他们本国一边。那时在中国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曾多至数千人,虽然其中有个别人自称“爱中国”,但是有哪一个传教士反对过他本国政府对中国的侵略?传教士中有的直接为他们本国侵略中国服务,收集情报,充当翻译;有的包揽词讼;有的强买土地;有的骑在中国教徒头上作威作福。天主教蒙上了被称为“洋教”的耻辱,这是近代中国天主教的主要状况。但是我们也不可把有的传教士所做的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事也一笔抹煞。有的传教士在教会学校中教中国学生学习外语,学习数理化,学习西医,学习工程技术,学习西乐和西洋绘画等,给中国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艺,客观上为中国培养了人才。有的传教士,尤其是不少外国修女为旧社会无钱求医的贫苦病人施医施药,这客观上是做了好事。至于如何看待鸦片战争后信天主教的教徒,也必须作具体分析。我国近代史上,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在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侵华战争中,天主教徒中为帝国主义侵略效劳的“二毛子”,确是有的。他们甘受侵略军和外国传教士的指使,做侵略军和外国传教士要他们做的事,如探情况,探消息,送信件,做劳务,等等。有的天主教徒依仗洋势,欺压他人。但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鸦片战争后,原来不信天主教而信天主教的人,可以说年年有,但入教的原因不一。其中许多人迫于生活,从教会得到一些物质利益,如受到救济,找到工作,等等,但他们仍主要以劳动为生。从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天主教徒从经过禁教时期下降至约20万又发展上升至约300万人。这约300万天主教徒中,大多数是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从事教育和医务等工作的知识分子,中

小工商业者,还有从教会办的男女孤儿院中长大的男女教徒。他们一般信教较虔诚,宗教感情较浓厚,思想较闭塞,较保守,对帝国主义缺乏认识,并盲目服从外国传教士,尤其是对教皇由于长期受到教内的影响产生了盲目崇拜的心理,但他们毕竟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至于中国神父、修女,他们在教内也是受压的,地位比外国神父、修女总是低一等,忠心追随外国势力的中国神父、修女,不是没有,但也是少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头几年,面对当时十分复杂的宗教状况,党和政府在对天主教的工作中,把披着天主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同广大教徒(包括神父、修女)严格区别开来,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靠全国各地天主教内相继涌现出来的一大批爱国先进分子,争取、教育、团结广大教徒,终于把外国势力控制、利用中国天主教的局面扭转了过来。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视对教徒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是团结教徒的宝贵经验。爱国不分先后。自20世纪50年代天主教徒认识有转变,有提高,相继走上爱国爱教的道路的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天主教徒是爱国的,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参加祖国建设,为振兴中华尽其一臂之力,这是当代中国天主教的新状况,体现了中国天主教的巨大变化。

教徒爱国主义思想的提高,会导致他们对过去教内散布的关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思想影响有所反思。天主教是一个有千年以上历史的宗教。它积累的思想十分庞杂,并涉及政治、社会领域。除了圣经、圣传和信条外,它还有一整套维护剥削者利益的政治、社会主张。共产主义产生后,1891年教皇良十三的《劳工通谕》、1931年底护十一的《四十年通谕》,几乎是所有受过教会传统教育的教徒都知道的纲领性反共文件。20世纪60年代起,教皇保禄六世制订“东方政策”,提出和共产党“对话”,但必须指出的是,教

皇历来谴责和反对共产主义的文件没有一件被撤销过,而所谓“对话”也是别有用心。更何况新中国成立以来,梵蒂冈反华势力一贯敌视,且至今与台湾当局建交。因此,对天主教徒来说,把天主教信仰与教皇的政治和社会主张严格地加以区分,是十分重要的。大家是天主教徒,天主教信仰相同,但作为中国天主教徒,就要有中国天主教徒应有的从中国人民利益出发的政治和社会主张。今天,中国天主教徒发扬天主教“爱主爱人”的精神,摒弃历来教皇的反共主张,割断政治上和经济上同梵蒂冈的联系,是天主教徒,但决不做梵蒂冈的“公民”,这是爱国的正义行动,也是爱教的具体表现,谱写了中国天主教史的新页。

中国天主教徒保持纯正的宗教信仰,在政治、社会问题上,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民主办教,同时为祖国建设作贡献,这就是当前他们所说的“爱国爱教”内容。“爱国爱教”是教徒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前进的动力。极“左”的思想对教徒爱教颇不以为然,认为教徒不爱教才能爱国。这完全是脱离教徒的实际。教徒过去由于受蒙蔽,爱国观念较淡薄,但他们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提高了爱国觉悟,会从爱国观念较淡薄,只知爱教,转为走上爱国爱教相一致的道路。要教徒不爱教,恰恰使他们对爱国产生疑虑,而且既破坏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又损害了党在教徒群众中的威信。

在旧社会,一些受被压迫被剥削之苦的教徒寄希望于死后“上天堂”得到幸福。解放后在旧社会受苦的教徒也同样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翻了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徒生活在新社会中。他们从亲眼看到的祖国日益繁荣富强,国际地位提高在国际事务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事实,从自己得到的切身利益,对社会主义祖国产生热爱,但他们一般仍保持宗教信仰。许多教徒通过家庭关系,把宗教信仰传给下一代。父母信教,子女也信教,代代相

传。随着岁月的推移,当前中国天主教徒中 50 多岁以下的都是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出生和长大的。六七十岁以下的教徒,他们的绝大部分岁月也是生活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尽管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进程中有失误,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给全国人民带来一场浩劫那样大的错误,但是也正是中国共产党自己从失误中吸取教训,并纠正了错误。改革开放以来的 20 多年,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党领导人民努力奋斗,在经济建设、法制建设、高科技领域和其他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果真这 20 多年来的发展中也产生了不少问题,有些问题十分严重,有待于能逐步得到真正的解决。但当前一个最活生生的最大的事实是:我国综合国力确实大大提高了,生产力确实大大发展了,人民生活确实大大改善和提高了。加上 1997 年香港回归,洗刷了百年耻辱,1999 年澳门回归,迎来了 20 世纪末又一盛事。新世纪伊始,2002 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2003 年金秋 10 月,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船神舟 5 号发射圆满成功,全国欢腾,举世庆贺。有爱国之心的教徒们亲身经历这一切,目睹这一切,同样会有感受,同样会由衷地说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但同时他们仍希望着死后“上天堂”。这样的教徒和一般人民群众的主要不同点是:一、过宗教生活,二、遵守天主教规诫,三、奉行他们认为是好的宗教道德。从教堂开放以来北京、上海等地天主教徒过宗教生活的情况看,他们主要是“主日”(即星期天)和“圣诞节”、“复活节”等几个大节日到教堂望弥撒,领“圣事”。可见,宗教生活只占这些教徒全部时间的很小一部分。许多在生产、工作岗位上的教徒的主要精力是用于生产、工作上。天主教规诫主要也是要教徒行善避恶,如天主教十诫中第四诫孝敬父母,第五诫毋杀人,第六诫毋行邪淫,第七诫毋偷盗,第八诫毋妄证,第九诫毋思他人妻,第十诫毋贪他人财物。有的教徒所以信

天主教,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规诫都是好的缘故。教徒奉行他们认为是好的宗教道德的情况,主要是他们所说的“爱人”、“诚实”、“宽恕”、“谦让”、“牺牲”等。不少教徒乐于助人,不与人计较,肯忍让,肯吃亏,不心口不一,不拿非分的东西,特别是在无人看到的情况下不做见不得人的事,等等。当然这样说,不是说教徒比其他人都好,更不是说教徒中没有不好的人,没有干坏事的人,没有违背天主教规诫,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以攻击教徒走爱国爱教道路,并和梵蒂冈反华势力遥相呼应的人。宗教道德,从总体上说,是教义、信条的延伸,出发点和目的性离不开宗教,但有些宗教道德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中公认的美德。因此,对宗教道德应给予恰当的评价,不应笼统地一概否定。宗教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确是不同的。但只要他们的道德行为对社会有利而无害,不但不应排斥,而且对他们所做的好事应和不信宗教的人所做的好事一样给予应有的评价,应予表扬的,同样予以表扬才是。

从天主教界积极开展与海外天主教人士的友好交往活动看,他们对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增进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保卫世界和平所起的作用,也是值得重视的。

在世界范围内,天主教徒人数较多。据称,全世界天主教徒人数已超过10亿。其中在东南亚,在北美,在西欧等地的华裔华侨中天主教徒为数不少。再拿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来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陆解放时那里的天主教徒约有1万人,现在已达30万人左右。澳门是历史上天主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天主教徒虽不多,但也有约2万人。香港天主教在大陆解放后有较大发展,教徒人数近30万人。在上述加起来那么众多的天主教徒中,对大陆天主教状况有较正确了解的,这些年来也增加了不少;但由于缺乏了解和有些媒体的误导而有着错误认识的还大有人在。我国天主教爱国人士积极开展与世界天主教

徒,与华裔、华侨中的天主教徒,与台湾天主教徒友好交往活动,并本着平等友好、互相尊重、互不干涉的原则,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天主教徒互相访问,促进相互之间的了解,显然这也是我国天主教界的一项爱国表现。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一项长期的政策。“文化大革命”中极“左”路线破坏了这政策。最近 20 多年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认真贯彻和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对做好宗教工作的讲话多次以显著标题见诸报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形势下,中国天主教有新的发展,出现了中国天主教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貌。天主教爱国人士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迥非昔比,北京教区傅铁山主教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令人瞩目。今天,中国天主教徒人数约 500 万,有着自己的全国和地方性的教务领导机构,即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各地天主教的教务委员会,有着自己的全国和地方性的爱国团体,即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各地天主教爱国会,行使中国天主教最高权力的是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中国爱国天主教徒是中国天主教的主人。这就使中国天主教在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唯一正确道路上不断前进,民主办教,永远不受外国势力支配,抵制渗透,有了可靠的保证。爱国的天主教徒足以自豪,也值得人们高兴!

笔者生逢其盛,走出校门后除“文化大革命”那段时间外,一直从事天主教工作和天主教研究工作,虽曾写了不少文章,也出过书,但自己不甚满意,常思拿出一件更好一点的作品,奉献于读者。本书定有不足之处,也可能有错误,但总算是遂了晚年的心愿。希望本书能有助于对宗教问题感兴趣的读者较客观、较正确地了解中国天主教过去的历史、今天发生的变化和出现的新貌,有助于宗教工作者能注意天主教的特点、汲取新中国成立以来天主教工作的宝贵经验,更加满怀信心地做好对天主教的工作,不断调动其积

极因素;对天主教徒读者,希望本书能有助于他们以史为鉴,倍加珍惜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来之不易的胜利硕果,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再接再厉,昂首前进!